

创榛辟莽

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

本书从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这一深具典型意义的史学机构切入，探讨「十七年」间（1949—1979）史学发展的具体状况。近代史所与延安史学机构一脉相承，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国家级史学机构，在海内外有深远的影响力。本书着力挖掘相关史料，超越单纯的史学文本研究，重返当时的时空语境，梳理近代史所的渊源脉络，将学人之「学」与其「行」结合起来加以考察，呈现学人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实际作为，展示「十七年」间史学发展丰富与复杂形态，在此基础上察其得失所由。

赵庆云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赵庆云 著



创榛辟莽

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 / 赵庆云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4

ISBN 978 - 7 - 5201 - 4630 - 2

I. ①创… II. ①赵… III. ①中国历史 - 近代史 - 文集 IV. ①K250.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8675 号

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

著 者 / 赵庆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李丽丽

文稿编辑 / 肖世伟 等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历史学分社 (010) 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7.5 插 页：0.5 字 数：418 千字

版 次 /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630 - 2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赵庆云，湖南邵东人，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学术史、史学史、史学理论研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史学理论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



范文澜先生1969年摄影。
(提供者: 刘明远)



金毓黻



1961年在云冈石窟。前排左起：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提供者：刘澍）



1956年苏联与蒙古学者访问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时于所内花台前合影。由左至右分别为刘桂五、刘大年、苏联学者、蒙古学者、范文澜。（提供者：刘澍）



1960年10月，时为京都大学副教授的井上清首次访问近代史所，此为在近代史所会议室前的合影。左一为译员庞春兰。（提供者：刘璐）

欢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同志们参加社教临别纪念以杭州西湖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参加社教临别纪念，1966年1月12日摄于江西丰城。前排左一刘桂五；二排左五刘大年；三排左三曲路武、右一王晶亮。（来源：人事处文书档案）



1960年左右于范老办公室前合影。前排左起：吴凤斌、王正烈、崔秀菊、王素、从翰香；中排左起：刘明逵、张中春、罗超、王明伦；后排左一黄德昭，右一谢琰造。（提供者：刘明远）

序 言

赵庆云新著《创榛辟莽：近代史研究所与史学发展》即将付梓，我已先睹，写下几句话。

近代史研究所“十七年”间的故事，现在很少人讲得完全了。我虽有16年时间担任研究所的负责工作，又在“文革”前进所，虽耳闻一些零星故事，也不能系统讲清楚近代史所与“十七年”史学的故事。我长期以为，近代史所的文书档案因“文革”动荡，早已不存于世，不免生有遗珠之憾。现在读了赵庆云的新著，方才知道他找到了近代史所“十七年”的文书档案，加上科学院的早期档案和个人日记以及回忆等资料，努力复原了近代史所“十七年”的历史，真是可喜可贺！

近代史所的历史，如果加上前身，已经过了70年。它的历史，它在中国科学院的地位和作用，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对全国史学界的影响和发挥的作用，已经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了，包括今天在事领导诸公在内。这些已成为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成为一门学问了。赵庆云的研究意义也在于此。

70年前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新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当然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中国科学院建立，在史学领域，为什么首先建立近代史研究所，而不是首先建立历史研究所，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话题。

范文澜作为延安马列研究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和华北解放区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主任，他的史学专精在中国古代史，他下的功夫也在《中国通史简编》，虽然他也编著了《中国近代史》上册。为什么他坚决主张中国科学院首先要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我想这要回顾延安的整风运动。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非常郑重地提出要改造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他认为党内的学习存在三个方面的弊病：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他认为这是极坏的作风。谈到研究历史，他说：“不论是近百年的和古代的中国史，在许多党员心目中还是漆黑一团。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还进一步指出：“对于自己的历史一点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经济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军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为了克服党内学习方法的三个弊病，它有三个针对性的提议。在研究历史方面，他提议：“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改造我们的学习》是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它和《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都是党的整风运动的基本文献。学习和贯彻这三篇基本文献，极大地改善了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提高了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政治水平。三篇文献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文献，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思想保证。

毛泽东所做研究近百年史的提议十分明确、具体。我们知道，范文澜在延安与毛泽东在研究中国历史问题上是有交流的。范文澜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水平是心悦诚服的。我认为，毛泽东在延安的这个提议，就是范文澜坚持在中国科学院首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的最重要的根据。

我在1964年8月进入近代史研究所，报到后两天就被所里派去参加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任政法组秘书。1964年北京科学讨论会是新中

国建国以后举国家之力举办的一次最重要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与会学者包括了文、史、哲、经以及自然科学各学科。我看到范文澜所长、刘大年副所长都是中国代表团组成人员，很活跃。在政法组，我看到刘桂五先生，也是很活跃的成员。刘桂五那时是近代史所的学术秘书，地位很重要。我在会上认识了安藤彦太郎先生和岸阳子小姐，他们两位后来结为夫妻，刘大年是他们两位的红媒。

说起刘桂五，我想起十多年前的一个故事。某年我在京西宾馆出席社科基金评审会。那里还有两院院士遴选会议在同时进行。我刚进房间坐定，就有人敲门。来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植物所一位老研究员。他进来对我说，看见社科基金的评审会在这里，他猜想一定会有近代史研究所的人参加，到会务组打听，知道了我的房间。他一进门就说，看见近代史所的人很亲切。他告诉我，1951年中国科学院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报告人是近代史所的刘桂五。他说，刘桂五说话声情并茂，举手投足，他都印象深刻。老院士还说，近代史所在科学院的地位极其重要，很不一般。刘桂五不是近代史所负责人，科学院请他在全院作抗美援朝动员报告，这件事情在今天不可想象。刘桂五说话声情并茂，与我的了解是相同的，可见这位老院士的记忆是准确的。

赵庆云早些年从我攻读博士学位，研究范文澜、胡绳、刘大年与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毕业后留所工作，很有成绩。他现在进入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是学有所归。

研究近代史研究所与“十七年”史学的关系，不是仅仅一个近代史所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国史学发展方向的问题，很有理论意义。我觉得，他的研究值得学术界关注，特作赘言如上。

张海鹏

2019年3月16日

于东厂胡同一号

目 录

CONTENTS

绪 论 / 001

第一章 近代史所的渊源及筹设背景 / 012

- 一 延安史学机构之沿革 / 012
- 二 近代史所之筹设 / 022
- 三 近代史所组织结构之嬗变 / 041
- 四 学术机构中的党组织 / 046

第二章 集聚人才与科研组织工作 / 070

- 一 研究队伍之组建 / 072
- 二 近代史所的“旧学人” / 099
- 三 集体研究与个人撰著的纠结 / 128

第三章 学术研究之理念和取径 / 147

- 一 以资料建设为中心 / 147
- 二 由专题研究到通史撰著的研究取径 / 176
- 三 史学研究与现实需要 / 185

第四章 近代史所与中国近代史学科发展 / 198

- 一 中国近代史学科地位之跃升 / 199
- 二 近代史所与中国近代史分期论争 / 207
- 三 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之努力 / 231

四 近代史学术刊物建设 / 252

五 中国近代史通论性著述之编纂 / 261

第五章 近代史所与全国史学界 / 279

一 全国性近代史会议之酝酿组织 / 279

二 组建“反修历史小组” / 298

三 近代史所与“四史”运动 / 322

四 推动“近代社会历史调查” / 349

五 近代史所与中国史学会 / 374

结 语 / 384

参考文献 / 395

索 引 / 414

后 记 / 423

一 选题意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伴随天翻地覆的政治变革，马克思主义史学进驻全国史坛的中心。“文革”前所谓“十七年”（1949~1966）史学，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中具有至为重要的地位，中外学术界对此均已给予一定关注。因十年“文革”的史学大体可存而不论，则当代中国史学，需要着重关注“文革”前“十七年”及改革开放后40年这两个时段。^①而要真正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特别需要整理“文革”前“十七年”的研究状况，^②皆因这二者之间实质上存在无法割断的紧密关联。

就大陆学界而论，既有关于“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之研究主要着眼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史家研究。关于“史学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已有颇为可观的著述。专著如谢保成著《郭沫

① 也有学者将“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史学相提并论，认为“前三十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时期，以农民战争史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学术动态报道：《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光明日报》2001年10月2日，史学版）。这一看法不无偏颇，“十七年”史学与“文革”史学虽具有关联性，但二者无论如何都不可等同。“十七年”史学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呈现出较为丰富与复杂的样态，不宜简单地以“泛政治化”一言以蔽之。

② 罗志田：《文革前“十七年”中国史学的片断反思》，《四川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5页。

若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陈其泰著《范文澜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王学典著《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张传玺著《新史学家翦伯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朱政惠著《吕振羽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方光华著《侯外庐学术思想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杜运辉编《侯外庐先生学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等。这类著述，由于论题集中，类似于掘井式的研究，自不乏深入细致之作，尤其在资料开掘方面奠定进一步探讨的基础。惟此种以人物为中心的研究，不免呈现“马太效应”，论述往往集中于少数著名史家，“史学五老”之下如尹达等已难顾及，^①遑论其他生前身后均名声不彰的学人。而且，个案研究亦天然有其局限，由于将关注焦点集中于个人，往往不易把握学术发展的整体脉络及时代背景，甚至以研究对象之是非为是非，失去研究者应有的裁断。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学风丕变亦影响到学术史书写。在学界近年绘制的现代中国学术地图中，一度被遗忘的王国维、陈寅恪、傅斯年、钱穆等已然居于显著位置，受到空前重视；与此相对应，曾经主宰当代中国史坛数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则门庭冷落，甚而有被边缘化之虞。在此情势下，以马克思主义学人为中心的典型个案研究，似呈难以为继之势。

其二，从史学思潮、史学流派着眼，侧重全景式把握和综论式评述。主要论著有桂遵义著《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肖黎主编《中国历史学四十年（1949～1989）》（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周朝民等编著《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蒋大椿著《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王学典著《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20世纪后半期

^① 近年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颇似中共史学界的发言人”（章群：《中共早期的历史研究工作》，学海出版社，2000，第31页）的刘大年亦引起学界关注，周秋光、黄仁国撰写《刘大年传》（岳麓书社，2009）；黄广友以《刘大年史学研究》为题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历史学院，2010）。

中国史学主潮》(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王学典著《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王学典、陈峰著《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张剑平著《新中国史学五十年》(学苑出版社,2005),姜义华、武克全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历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侯云灏著《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这些著述着眼于宏观脉络的把握,为我们勾勒了“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总体面貌。但因论述范围广泛,难以进行具体深入的考察。其中王学典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年,善于通过建构理论概念来把握史学发展的大势,如发挥周予同、余英时之“史观派”、“史料派”概念,以二派之对抗消长为脉络纵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50年史学;^①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为主线条理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②以“新史学”、“新汉学”的斗争和轮回为主线来梳理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③这些论述多有所见,较一般综论式的著作更为深入,在学界引起颇为热烈的反响。但此种以理论概念条理史事、以截然派分研治史学史的路径,仍不免存在局限。这些概念工具看似可以笼罩所有,实则有时与真实情况难以切合。由于著者的主观取舍,有意无意之间,或片面放大,或视而不见,在条理毕具、脉络愈益清晰的同时,仍难免陈寅恪所谓“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的质疑。

此外,关于“十七年”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张海鹏、龚云著《中国近代史研究》、张海鹏著《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索》(《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关于某些重要史学理论问题的评述亦值得注意。主要有:龚书铎、李文海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论辩书系”,含《中国历史人物研究论辩》、《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论辩》、《中华文明起源和民族问题的论辩》、《中国资本

① 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

② 王学典:《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

③ 王学典、陈峰:《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